

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初探：史觀、戰爭、框架*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Problem” in Taiwan: Viewpoints, War, and Frames

汪宏倫 (WANG, Horng-luen)
台灣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playing a special role in the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the so-called “Historical Perception Problem” (歷史認識問題, HPP, a term idiosyncratically coined to referred to the problem pertaining to 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is perceived) in East Asia. On the one hand, it is either marginalized or even excluded in these debat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iwan problem,” itself an “HPP,”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right-wingers in Japan, which leads to the impression that Taiwan is on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side” of history. As a result, Taiwan’s own HPP has been either overlooked or misunderstood in previous discuss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ed new light on Taiwan’s HPP by investigating it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Instead of seeing it as struggles between two contesting “views of history,”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of “frames of war,” inspired by Judith Butler and Erving Goffma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exist three intersecting yet mutually conflicting “frames of war”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frames of war, which shape people’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an help us better grasp the nature of debates concerning Taiwan’s HPP. In conclusion, it is emphasized that, in order to solve the HPP, it is essential to transcend the nationalist frames, and such a principle should be applied equally to all cases in East Asia rather than to merely a few specific ones.

一、東亞「歷史認識」問題中的台灣

所謂「歷史認識」問題，一直是東亞國族政治（nationalist politics）的一個重要焦點¹。這個問題不僅影響著國際之間的交往互動，同時也是日本國內政治的重要分野，而這兩者之間，往往又存在著複雜的牽連。根據高橋哲哉所主編的《〈歷史認識〉論爭》一書，歷史認識論爭在2002年該書出版之際，已經進行了將近十年了。根據高橋的說法，歷史認識論爭始於1990年代初期，從「慰安婦」開始，在舊日本帝國侵略戰爭或殖民地支配下受到傷害的人們紛紛挺身而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的一連串事情而揭開序幕（高橋哲哉2002：1）。到了1990年代後半，「自由史觀研究會」及「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接連興起，批評日本戰後的「自虐史觀」，掀起了歷史認識論爭的高潮。2001年，扶桑社所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檢定出版，小泉首相接連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引發國內外批評抗議，將歷史認識爭議推向另一波高峰。

* 本論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NSC100-2410-H-001-081-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蕭阿勤、王甫昌在筆者寫作期間慷慨提供所需查閱之文獻資料，助理張育齊協助蒐集與整理資料，在此一併申謝。

¹ 眾所周知，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主要是從西文的nation與nationalism來的，而nation在英文裡有時指「民族」、有時指「國家」，有時則兩者兼具，造成翻譯與指稱的困難。本文則兼顧一般習慣用法與上下文脈絡，有時以「民族」（如「民族主義」）、有時以「國族」（如「國族問題」）稱之。

誠如高橋所說，歷史認識問題雖然與日本息息相關，但絕不是只侷限在日本的孤立問題，而是牽涉到東亞各國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認識問題可以追溯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因教科書檢定過程中要求將「侵略」改為「進出」而引發中、韓等國抗議的風波。日本政府為此特別訂定了「近鄰諸國條項」，要求教科書在記述關係到亞洲近鄰諸國之間的近現代史時，必須考慮到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這大概可以說是戰後「歷史認識問題」的濫觴²。因此，我們大致可以說，東亞歷史認識問題基本上環繞著日本為核心，同時存在於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

事實上，不僅中日韓之間、以及日本的左派與右派之間，存在著歷史認識問題，台灣內部的「統派」與「獨派」之間，乃至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都存在著歷史認識問題——儘管許多時候，這些問題並不以「歷史認識」的名義出現。然而，當前有關東亞歷史認識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日本的左右派之間，以及日本與中、韓之間。在這些討論中，台灣如果不是被邊緣化、甚至被忽略，就是處於尷尬的位置。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05年間以中、日、韓文在三國同步出版的《東亞三國近現代史》。這是一個以民間團體為主、以「開創未來」（未來を開く）為目標的東亞跨國近現代史共同教材編寫計劃，其中僅有中、日、韓三國的歷史學者參與，台灣完全沒有人受邀參加³。這個計劃後來再接再厲出了第二套書，取名為《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下冊）（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2013）。儘管第二套教材標榜著要「超越國境」，但似乎沒有真正「超越國族」，台灣依舊沒有學者受邀執筆。儘管這個共同編寫歷史教材的跨國計劃立意甚佳、精神可佩，但台灣被排除在外，毋寧是個缺憾。

台灣在東亞的歷史認識問題中還有一個尷尬的角色，就是與日本右派的糾葛。1990年代後半，正當「自由主義史觀」與「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在日本國內外引發激烈爭議時，台灣內部也正進行著一場可以稱之為「典範轉移」的史觀革命。一個以強調台灣主體性、認同台灣本土意識的新史觀，取代了原有的大中國史觀，逐漸成為官方論述的主流。根據這樣的史觀所撰寫出來的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在1997年問世時，引發軒然大波。反對者批評這套教材充滿了「親日」、「媚日」的史觀，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貢獻，與日本右派美化日本戰前歷史的描述如出一轍，也引起部分日本學者的不安而屢遭質疑⁴。尤其「新歷史教科書創作會」的成員之一小林善紀在2000年出版《台灣論》，表面上看起來是以漫畫的形式介紹台灣，其實是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透過在台灣尋找「失落的日本精神」來重建日本民族主義。

《台灣論》與小林善紀先前出版的《戰爭論》（1998）一樣，同屬他的「新傲慢主義宣言」的系列之作，台灣只是被拿來當成合理化大日本帝國的侵略戰爭與殖民政策的工具，而在小林著作中出現的台灣人，多半是被視為「親日」的日本語世代，其中甚至包括當時掌台灣最高政治權力的李登輝總統。和《戰爭論》相同，《台灣論》出版後，也引起日本左派學者的群起批評（東アジア文史哲ネットワーク2001）。2001年，《台灣論》被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同樣也掀起了統派與獨派之間的論戰（參見黃昭堂等2001，李壽林2001）。很顯然地，

² 在此之前，日本的教科書並非從未出現過爭議（例如家永三郎的教科書檢定訴訟），但並未像1982年這次引發鄰近諸國的抗議。

³ 中文版參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2005），日文版參見日中韓3國共通歷史教材委員會（2006）。

⁴ 例如《認識台灣》歷史篇的編撰者之一吳文星在日本發表論文，肯定日本統治下台灣社會的變遷時，便引起不少疑慮，有人質疑這種只描述殖民者正面影響的做法，恐將為日本右翼所利用。參見比較史・比較歷史教育學會（2002）。

當時居於台灣主流的本土派，本來是為了要矯正國民黨長期威權統治所造成的扭曲，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卻因為被視為「親日」，加上與日本右派的連結，似乎站在「政治不正確」的「錯誤一方」。

上面的討論使我們發現，台灣在東亞的歷史認識問題中，不是被排除/邊緣化、就是處於尷尬可疑的位置。在這些論議中，台灣經常成為「缺席的主體」，不是由自己訴說自己，而是由他人根據不同的角度或需要來訴說台灣。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嘗試將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帶入東亞的討論脈絡中，除了讓人們對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能多一點理解，也希望能夠有助於讀者進一步思考東亞整體的歷史認識問題。

另一方面，上述的討論也提醒我們，在論及台灣的時候，必須對這個全稱式的語彙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覺，因為「台灣」這個詞的指涉與意涵，本身就是「歷史認識問題」的一部分。從地理範圍來說，台灣指的也許是過去曾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及其周邊小島，有時則包含了澎湖金門與馬祖諸島。從政治意涵來說，台灣有時被當成國家，有時則不被當成國家。儘管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著台澎金馬諸島，但究竟中華民國/台灣是不是個「國家」，在台灣的內部與外部，都存在著分歧極大的看法。這樣的狀況，在其他案例是比較特殊而少見的。這個特殊的條件，對於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也有著根本而關鍵的影響。從群體集合來說，台灣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與這個地理空間的關係十分不同，除了先來後到的差別外，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對於「台灣」這個共同體的想像，無論是過去的記憶、現狀的定位與未來的藍圖，都南轅北轍，彼此扞格不入。同一個政治社群內部的人們懷抱不同的認同，對於此一社群的過去與未來抱持不同的想法，這在當代許多社會都不少見，台灣也許不顯得特殊。然而，與中、日、韓等鄰近諸國比起來，台灣的這些群體意識與認同分歧的情形格外嚴重，他們之間的歷史記憶彼此衝突，而造成衝突的根本原因，則與東亞近代以來一連串的戰爭有關。

二、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一個簡要的勾勒

歷史認識問題可以分成「廣義」與「狹義」兩個層面。如同高橋哲哉所說，歷史認識與「歷史學的認識」不同。歷史認識是建立在歷史學的成果上，對於「我們從哪裡來、要朝何處去」的問題加以考察。這可以說是廣義的歷史認識。狹義的歷史認識，則可說是「歷史書寫的政治」，也就是「如何篩選、書寫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問題。廣義的歷史認識問題與狹義的歷史認識問題是分不開的，因為人們如何認識自己的過去，必然牽涉到歷史如何書寫的問題，而人們所認識的歷史，又與他們曾經接觸過的書寫歷史（尤其是學校中所接受的歷史教育）有關。因此，歷史認識問題總無可避免地會牽涉到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在台灣，廣義的歷史認識爭議幾乎天天都在發生，由於認同的分歧與歷史記憶的衝突，人們對於「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朝何處去」等問題，隨著議題的不同而每日爭吵著⁵。至於狹義的歷史認識問題，主要也是展現在教科書的問題上。在這個意義上，台灣

⁵ 這些議題從詞語的使用（例如：稱「光復」還是「終戰」、「日治」還是「日據」等），到特定事件議題（如對電影《KANO》或歷史人物八田與一的評價），幾乎每天都在不同立場的媒體出現。這些議題看起來似乎瑣碎微小，但都牽涉到歷史認識。

的歷史認識問題，主要出現過兩次主要爭議，一次是在1997年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第二次則是出現在2014年初，即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爭議上。⁶

和日本的情況類似，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也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史觀。在日本，有所謂「東京裁判史觀」或「自虐史觀」與「自由主義史觀」或「皇國史觀/靖國史觀」之間的對立；在台灣，則有「中國史觀」與「台灣史觀」的對立⁷。前者主要是戰後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時候，透過教育體制等方式所建立的史觀，以中國為主體來書寫、講授歷史；後者則是反國民黨的異議分子與台灣民族主義者所建立的史觀，強調台灣的主體性，以台灣為中心來書寫歷史（王甫昌2001，蕭阿勤2012）⁸。

歷史認識問題的出現，和台灣戰後的政治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政策。1997年，教育部開始在國民中學一年級實施《認識台灣》課程，國立編譯館出版了一套名為《認識台灣》的中學教科書，分成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三冊出版。這套課程原來是為了矯正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彌補過去在國民義務教育中只講授中國史、不教台灣史的不足。在過去的教育體制中，歷史敘述以中國與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為中心，台灣僅被當成中國的邊陲來講授，台灣被殖民的歷史經驗被忽略，而有關國民黨在台灣所造成的暴力傷痕（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則隻字不提。《認識台灣》，顧名思義即是要學生重新認識過去被壓抑、掩蓋、扭曲的台灣。然而，這套教科書還沒正式推出，便引起中國史觀者的強烈抗議，認為這套教材充滿「媚日反中」的傾向。批評者在台灣社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激烈辯論，後來且將相關文字集結成書，用意在「為歷史留下見證」（王仲孚2001）。這套教科書也引起了海峽對岸的不滿，多位學者與評論員紛紛在期刊或報端（如《人民日報》）撰文抨擊⁹。此事也引起日本方面關注，教材中的「歷史篇」與「社會篇」皆被翻譯成日文出版。顯然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也和日本一樣，不只是個國內問題，影響也遠及國外。

《認識台灣》雖然引起軒然大波，但其實只能算是個妥協的產物，統派固然抗議反對，獨派其實也不十分滿意，因為裡面許多事件與用語，都還不是完全按照獨派的史觀來撰述的

⁶ 除了這兩次較為顯著的爭議外，也曾出現過許多較小的爭議，但論規模和效應都不及這兩次事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於2001年在台灣翻譯出版，也曾引起另一波關於歷史認識的論戰。不過，由於這波論戰並未直接涉及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因此暫不列入此處（狹義的）歷史認識討論中。

⁷ 在日本，除了「自由主義史觀」是由提倡者（藤岡信勝）自己提出的之外，其他如「東京裁判史觀」、「自虐史觀」、「皇國史觀」、「靖國史觀」都是論辯雙方加給對方的封號，其中多帶有貶義。在台灣，「中國史觀」有時也被對手冠上「大」字成為「大中國史觀」，暗示其霸權心態。至於「台灣史觀/本土史觀」有時則被對手稱為「台獨史觀」或「皇民史觀」，指其受日本皇民化遺毒影響。本文為了討論方便，將以中國為中心的史觀稱為「中國史觀」，以台灣為中心的史觀稱為「台灣史觀」。

⁸ 值得留意的是，國民黨在台灣所建立的「中國史觀」與共產黨在1949年建國後所樹立的官方史觀（或許也可稱為另一種「中國史觀」）又十分不同，尤其有關近現代史的詮釋常有相違（參見下文討論）。另一方面，2014年參與歷史課綱的成員中，也包括過去因為反國民黨而遭到迫害的左統人士（如王曉波），而左統（統一左派）的史觀，和國民黨相較，恐怕更接近共產黨。這提醒我們，乍看之下都是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史觀，其實內部仍舊存在歧異，也很容易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僅僅停留在「史觀」層次的討論，無法讓我們更深一層看到其中的差異與不同力量的作用。

⁹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章後來被台灣的知名作家陳映真（許南村）編輯成冊，在台出版（許南村1999）。不過，原作者的名字均略作改動（例如知名的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前所長陳孔立被改為「陳昱立」），原文的許多用語也經過修改（如「祖國大陸」改為「中國大陸」，「分裂祖國」改為「分裂中國」），原來被加上引號的字詞（如：「國立」編譯館）在台灣出版時也都把原先的引號去除，使得整本書看起來像是由台灣的作者所寫。參見田習如（2002）。

¹⁰。進一步的調整，其實要到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之後才逐步完成。總的來說，從1994年杜正勝在報端發表《本土、中國、世界》一文，到1997年《認識台灣》課程，歷經1999年的「八八課綱」，再到陳水扁主政時期推動的「九五暫綱」，以「台灣—中國—世界」為架構的「同心圓史觀」大致確立，成為官方教科書的書寫原則，不但台灣史的書寫篇幅與教學比重與中國史等量齊觀（均佔高中歷史課程的一個學期），也淡化台灣與中國間的歷史連帶¹¹。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更請獨派的台灣歷史學會檢核教科書中五千多個「不當用詞」（例如將「全省」改為「台灣」、「國父」改為「孫中山先生」、「我國歷史」改為「中國歷史」等），引發「去中國化」的批評。

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政策改弦更張，相關的教育政策也做了調整。先是原定在2010年實行的「九九課綱」中的國文與歷史兩科暫緩實施，而後在2014年公佈「微調」之後的課綱，引發第二次的教科書爭議。在這次事件中，主要的爭議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程序問題，另一個則是內容問題。在程序方面，批評者認為「微調」過程倉促決策粗糙，有違民主運作原則。在內容方面，批評者認為調整後的課綱並非僅是少數用語的調整（例如將「中國」改為「中國大陸」、「日治」改為「日據」等），而是重新回到威權時代的大中國史觀，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連帶，貶抑台灣的主體性，是「去台灣化」，且歷史課綱的調整是由少數幾位政治立場鮮明的非歷史專業的人所主導，導致許多錯誤。

從1997年《認識台灣》被批評為「去中國化」，到2014年的課綱微調被批評為「去台灣化」，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是兩種主體性（台灣與中國）之間此消彼長的拔河。簡單地說，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可看是兩種民族主義史觀的鬥爭，哪一方掌握了政治權力，便嘗試將自己的觀點變成官方的觀點，作為教科書的撰寫標準。這樣的鬥爭基本上是個「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對有些人來說，台灣在過去歷史上從來只能被動接受外在強權勢力的擺佈，人民的權益受侵犯、尊嚴遭踐踏、情感被傷害，無法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為了要建立並維護台灣自身的主體性，必須要依賴國族的建立才能得到保障。而要建立台灣國族，除了政治上保持獨立自主外，在文化與歷史上也要盡可能與中國劃清界線。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台灣問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日本效法列強瓜分中國，以不正當的方式強取台灣作為其殖民地，才造成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分離。二次戰後，日本已將台灣交還給中國，然而卻因國共內戰，使得兩岸在短暫結合後又再度分離。儘管兩岸當前仍屬分治狀態，但將來還是必然走向統一，台灣是無法自外於中國歷史之外的。兩種史觀各有理據，也都認為自己的史觀具有正當性甚或優先性，比起對方的來得更好或更加正確。這裡面牽涉到許多價值判斷的問題，本文並不擬涉入。本文所打算做的，是退後一步，考察這些史觀背後的框架。

¹⁰ 事實上，《認識台灣》的編審委員並非清一色為獨派學者，其中也不乏中國史觀的知名學者（如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實強），他們某種程度上也是為這套教材背書的。呂實強（1996）後來也曾撰文說明過程經緯並表達自己立場。

¹¹ 不少論者把《認識台灣》與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等同起來，其實並不盡然。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一開始是針對高中歷史教育而發的，而《認識台灣》則是針對國中一年級的學生所設計的課程，其規劃可追溯至1993年，比杜正勝（1997）正式提出「同心圓史觀」的時間還早。杜正勝後來雖然也參與了《認識台灣》的編輯，但他所主持的是其中的「社會篇」，「歷史篇」則是由中興大學的黃秀政負責。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認識台灣》屬於國中基本教育課程，後來被併入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社會學習領域」，不復以單獨科目形式存在；而以民國年份簡稱的「八八」、「九五」、「九九」等課綱，指的則是高中課程綱要。

當前對歷史記憶的研究多半指出，歷史與記憶是人們根據當下現實的需求而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所作的重新組合與詮釋，因此是一種「現在的過去」（present of the past）。這樣的說法固然屬實，但似乎過於簡化，無法解決一個矛盾，即：人們對當下的認定又是怎麼來的？現在並非一個孤立斷裂的時間點，與過去仍然存在著聯繫。以兩種史觀的對立來理解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固然是最為直接簡便的方法，但這樣的理據，恐怕仍停留在表象的層次。史觀顧名思義，指的是書寫或看待歷史的觀點。現有的討論，大多是直接涉入史觀的爭辯；對於史觀如何形成、如何影響人們的看法，相關的探究還是比較欠缺。如前所述，史觀牽涉到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的問題，而認同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不是單純靠論辯可以說服對方，因此這樣的爭論很難真正被化解。

過去許多關於歷史認識的討論都曾提到，要化解不同歷史認識的衝突矛盾、達到和解與共生，首先必須要跨越國境、甚至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高橋哲哉2002）。在台灣，無論中國史觀還是台灣史觀，基本上都未超脫民族國家的框架，反而極力去維護民族國家體制；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僅是國族想像的不同而已。所謂史觀的爭議，其實源自不同的國族想像。本文並不打算處理這些爭議的內容，更不是要對這些爭議進行評價，而是後退一步，查看這些爭議的起源，考察所謂「歷史認識」爭議的本質究竟為何。從社會學的方法論來說，這個「退後一步」的動作，可以說是一種「現象學的態度」，有別於一般人們在爭論中所採取的「自然態度」¹²。

所謂歷史認識問題，其實與民族主義問題是交纏在一起的，這不僅在台灣如此，其他案例亦然。因此，要理解歷史認識問題，不能不先對台灣的國族問題有所理解。從現象學的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¹³角度來看，台灣的國族問題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加以理解，第一是制度面，第二是情感面，第三是認知面。從制度面來看，台灣的國族認同危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華民國的制度危機——由於中華民國在1970年代之後失去代表中國的合法性，使得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在國際與國內都開始產生危機。虛構的中華民國主權在國際上不被承認，被制度化在教科書的中國史觀，不再符合台灣的現實狀況，人們要求不再從中國史、而是從台灣出發來撰寫與講授歷史。事實上，培養「國族觀」的歷史教育也是民族國家的制度的一部分（汪宏倫2001a），要求重寫歷史，也是對失效制度的一種回應。過去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被壓抑的歷史記憶——包括殖民地的記憶、二二八的記憶、白色恐怖的記憶等，被要求寫入教科書中。從情感面來說，台灣民族主義有一種被壓迫者的「悲情意識」，使得一部分人發展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觀（史明1980）。這種史觀強調，台灣的歷史始自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台灣並非自古屬於中國，而是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等相互競逐。台灣的政權更替頻繁，卻都不是由島上的居民自主決定。台灣史觀的提出與台獨的訴求，在於強調台灣這塊土地以及居住其上的人民，在過去的歷史中被當成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命運任人擺佈，因此有「自己當家做主」的主張。上述這些都促成了重新撰寫台灣史、

¹² 關於「現象學態度」與「自然態度」，參見Schutz（1962）。

¹³ 現象學一般咸認奠基於胡塞爾（Edmund Husserl），但真正將現象學帶入社會學的是同時代的謝勒（Max Scheler）。舒茲（Alfred Schutz）同時受到兩人影響，建立了現象學的社會學派，Berger and Luckmann（1967）的名著《社會現實的建構》可說是此一取徑的代表著作。當前流行的「社會建構論」，追本溯源來說其實來自現象學。

重編歷史教科書的呼聲日高。然而，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深入討論制度層面與情感結構的問題，僅能就最後一個面向，也就是認知框架的問題來加以探討。¹⁴

前引《〈歷史認識〉論爭》一書，原先規劃的書名為「戰爭/戰後責任」，後來才改採現有書名（高橋哲哉2002：3）。顯然歷史認識問題與戰爭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主張將歷史認識問題當成戰爭遺緒（war legacies）的一部分來加以理解。歷史認識問題的核心爭議之一，在於對某些特定戰爭及其結果的認識問題，因此也可說是「戰爭認識」問題。此處的戰爭認識，指的不僅僅是「如何認識戰爭」，更是「戰爭如何創造出一種新的框架，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識」的問題。這種戰爭所創造出來的認識框架，筆者稱之為「戰爭之框」。由於台灣之所以產生政權更替，主要還在於東亞近代史上的幾場關鍵戰爭。因此，理解這些戰爭如何形塑人們的認識框架，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顯得格外重要。

以下，筆者將先從現象學的社會學角度，界定「戰爭之框」；其次，討論台灣現存的三種戰爭之框，並進一步分析這三種框架如何影響人們對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看法。結論部分，將探討戰爭之框對思考東亞歷史認識問題可能帶來的啟發。

三、理論概念：「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¹⁵

所謂戰爭，主要指兩個有組織的武裝政治團體（其中通常至少一方為國家）之間進行的暴力抗爭。在國際法上，主權國家之間的戰鬥行為被視為戰爭，但不是主權國家的交戰團體，通常不被視為戰爭，而被視為叛亂、暴動或內戰（Bull 1977: 184-6）。本文對戰爭的界定並不循此。只要兩個武裝團體的暴力抗爭是以政治權力的分配、遂行或爭奪為目的，就可以視為戰爭。因此，台灣早期漳泉、閩客之間的械鬥不太能算是戰爭，但「霧社事件」可說是個戰爭，1927年8月1日發生於南昌的武裝鬥爭（國民黨稱之為「南昌暴動」，共產黨稱之為「南昌起義」）也是戰爭。至於稱之為「事件」、「暴動」還是「起義」，端視詮釋者所仰賴的框架而定，也就是本文所稱的「戰爭之框」。

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主要有兩個概念來源，首先當然是來自Judith Butler（2009）同名之作的啟發。在*Frames of War*一書中，Butler利用英語frame一字兼具「框架」、「構陷」等多重意涵，界定「戰爭之框」為「選擇性地刻畫作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的方式，從而構成了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她以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虐囚照片為例，探討「戰爭之框」如何讓人們區分「可悲傷的」（grievable）與「不可悲傷」（non-grievable）的生命。Butler進一步借用此一比喻，探討包括性別政治在內的主體形成，哪些生命是被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生命是被刻意忽略、甚至不被認為有資格形成主體的。

本文對「戰爭之框」的界定與分析方式，主要還是承襲第二個來源，即社會學中「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傳統。在《框架分析》這本被廣為引用的著作中，Goffman將框架界定為「管理社會事件以及我們對其主觀涉入的組織原則（Goffman 1974: 10-11）」。根據Goffman，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s），人們必須透過這些基本框架來認識世界、理解當下；缺乏這些基本框架，世界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¹⁴ 關於台灣國族問題的制度因素與情感結構，筆者過去均已有專文探討，參見汪宏倫（2001a, 2001b, 2006, 2012）。

¹⁵ 本節與下節文字主要改寫自筆者另一篇論文〈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2014b）中之部分段落。

Goffman承襲Schutz的現象學傳統，關心的是人們如何感知外在、界定現實的問題。個人面對這個世界紛然雜陳的刺激、現象與事件，必須仰賴一些基本的原則來選取與組織她的經驗，才能產生意義，而這些基本原則就是Goffman所稱的框架，或可稱為識框(cognitive frame)。我們可以說，框架或識框指的是建構意義時所依據的要素選取原則，行動者藉此選取原則來界定其所面對的現實。這個理論觀點後來被大量應用在社會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中(Snow et al. 1986, Benford and Snow 2000)，包括媒體研究與心理學等其他學科也都有「框架分析」的傳統。

框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被「定調」與「再定調」(keying and rekeying)的。Goffman借用了音樂的類比來使用「調性」(key)這個概念，將之界定為「一組慣習，這種慣習將原本根據基本框架已經有意義的活動，轉化為另一種同樣模式的活動，但對其參加者來說其意義已經有所不同」。Goffman舉的例子是一群看似在打架的孩童(或動物)，他們從事的活動從外表來看與爭鬥無異，但其實他們僅僅是在玩耍，而不是真的在爭鬥。框架的定調/再定調可視為是一種框架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frames)，而這又牽涉到再一次的框構過程(Snow et al. 1986)。

根據這個「框架分析」的傳統，「戰爭之框」包含兩種意涵，第一種意涵指的是戰爭所創造出來的認識框架，第二種意涵則是指人們藉以界定、理解、詮釋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這兩種意涵是相關的，但內容不完全相同。在第一種意涵中，作為一種為歷史事件，戰爭可以改變外在的結構條件，例如領土，政府(主權)、人民(遷徙、流亡)、資源分配等；另一方面，戰爭的發生與其結果，也可能改變內在的心靈結構，創造出一種新的認知框架，這種認知框架會影響到人們看待自我與世界的方式，當然也包括對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方式。和社會運動類似的是，戰爭需要集體動員，戰爭之框便是動員與被動員者建構戰爭意義的主要框架。然而，戰爭動員的層面比起社會運動來得廣泛全面得多，尤其在現代，戰爭之框經常涉及國族建構，並非所有的國族成員都被動員直接參與戰爭，但戰爭之框卻提供了國民全體理解與詮釋戰爭的框架。和國族的建構一樣，戰爭之框也有「從上而下」與「從下而上」的雙向框構過程。在一開始的時候，戰爭之框比較有可能是國家由上而下的建構過程，用意在區辨敵我，動員人力與物力參戰。但隨著戰事的進展與時間的推移，戰爭之框也會不斷被知識份子、文化菁英與一般民眾加強、放大乃至重塑。因此戰爭之框不僅可見於國家的動員文宣與行動，更可見於諸多描述、討論與詮釋戰爭的相關論述與實作裡，諸如文學、戲劇、電影、藝術作品等。

作為一種提供意義與價值的框架，戰爭之框首先要劃定界線，區辨敵我。Butler的戰爭之框指的是框架/構陷那些戰地攝影作品的有形/無形的框，而本文的戰爭之框指的則是框構戰爭群體內外之別的無形的框。和Butler的戰爭之框類似的是，本文的戰爭之框也同樣區分了「可悲傷 vs. 不可悲傷/不值得悲傷」、甚至是「值得活 vs. 不值得活」的生命。框外的敵人不是野蠻的匪徒、邪孽的妖魔就是萬惡不赦的反動派，他們不僅是「非我族類」，而且不是「人」，不值得同情憐憫，非僅可殺，而且該殺。消滅這樣的生命不僅不值得惋惜，還該慶幸，甚至要積極參與。二戰期間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日本把盟國稱為「鬼畜米(美)英」、盟軍的宣傳把日本人說成是猴子，這些都是著名的「戰爭之框」把對手「非人化」的例子。

在戰爭之框的內部，則是可悲傷的生命。共同的受苦經驗是激發團體凝聚力的最佳秘方，古今中外皆然。Renan在其《何謂國族》的知名演說中便曾有名言：「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國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它[對公民]施加義務，要求同心協

力。」（Renan 1990: 19）戰禍總是帶來人民的死傷、財產的損失與家園的破壞。戰爭之框一方面要保護框內人民的身家財產安全，一方面要為已經產生的禍害與死傷提出解釋。除了苦難所造成的「受害者」意識外，戰爭還需要英雄、需要鬥士，也需要殉道者（烈士）。戰爭之框要深沈地哀悼苦難死亡，更要激憤昂揚，尋求救贖。因此，戰爭之框不只是一種暫時的「情境定義」而已。作為一種關涉到人的個體生命的終極存在——生與死——以及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可能帶來的災害與苦難，戰爭之框必須承載極為沈重的意義，背後或多或少必然隱含一種神義論（theodicy），為人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不公不義、苦難與傷亡提供最終的補償與救贖。在過去，這種神義論大多由宗教提供；在現代，民族主義成為神義論的主要來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可說是現代社會的宗教。幾乎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都歷經不同程度的戰爭或集體暴力（如內戰與革命）的洗禮，也都有其哀悼、紀念乃至祭祀的儀式¹⁶。

戰爭的名稱，也是戰爭之框的反映。同一場戰爭，交戰雙方的命名方式很有可能極為不同。當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在戰後被改稱為「太平洋戰爭」時，戰爭之框已經改變了。戰爭之框提供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框架，其作用猶如孔恩所稱的「典範」（Kuhn 1962）。不同的典範之間可能是「不可共量」的，戰爭之框也是如此。不同的戰爭之框，可以相互連結，但相互敵對的戰爭之框，則往往是不可共量的。戰爭之框與一般所稱的「史觀」不同，在於其所強調的不僅只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基本架構，包含了意義、價值、生死觀等。不同的觀點之間或許可以相互包容，但相互衝突的戰爭之框間卻是不可共量，也難以彼此包容的。

作為一種認知框架，戰爭之框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探究。認知框架本身並不是意識型態，它可能受到既有的意識型態形塑影響，但也有可能透過有意識的建構而發展出新的意識型態¹⁷。和Bourdieu (1977) 的生存習性（habitus）的概念類似，戰爭之框同時有可能「框構與被框構」（framing and framed）。在某種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意識型態可以為戰爭之框「定調」（例如軍國主義的意識型態將「大東亞戰爭」定調為「聖戰」）；而當意識型態發生轉變，戰爭之框也可能被「再定調」（如日本戰後出現的「和平基調」）¹⁸。

同樣地，戰爭之框也是形塑歷史與集體記憶的重要框架。Halbwachs分析記憶與歷史的關係時，曾經區分了個人記憶、歷史記憶、集體記憶以及歷史四者，而無論是哪一層次的記憶，我們都必須考察形塑這些記憶的社會框架（Halbwachs 1980, 1992）。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多半涉及不同程度的戰爭，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的歷史與記憶（尤其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某種程度都受到戰爭之框的形塑。

框架並不是一種本質性的存在，因此在社會運動中，框架可以被動員、重組、聯合、挪用。就個人層次來說，作為一種組織經驗與定義情境的原則，框架可以被建構，更可以被傳承、習得、採用。在基本的微觀互動中，一個人在面對他者時，他/她要如何與對方互動，取決於其認知框架。如果他將對方視為敵人，那麼他會採取對抗或競爭的行動；如果他將對方視為朋友，那麼他會採取友善或互助的行動。此外，戰爭的終點在求勝，以擊敗敵人、屈服敵人的意志為最終目標，只要能擊敗敵人的策略都可能被採用。因此，在策略結盟的情境下，

¹⁶ 值得留意的是，在悼亡與紀念方面，西方與非西方似乎也存在一種時間差。歐洲為戰死者悼亡紀念的高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則是在二戰之後。參見高橋哲哉（2005a, 2005b），子安宣邦（2004）。

¹⁷ 在社會運動的文獻中，認為框架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很難被以機械、單向的方式來界定。參見Oliver and Johnson (2000), Snow and Benford (2000), Snow (2004)。

¹⁸ 關於日本「和平基調」的討論，可參見汪宏倫（2014a）。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結合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是典型的例子。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同的戰爭之框可以相互結合，也有可能被重新定調。

相互衝突的框架彼此不可共量，但人們可以選擇給框架重新定調、跳脫框架、或是拆散框架。在某些情境下，跳脫框架並非易事，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儘管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例如在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時，國內並非完全沒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反戰者往往被消音、甚至被迫「轉向」，否則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在現代民族國家，戰爭之框可能被制度化或常態化，透過教科書、電影電視、歌謠戲劇、紀念碑、博物館等各色各樣的媒介散播複製，代代相傳。因此，戰爭之框並不是只有經歷戰爭的人才會有，而是會傳承給未曾經歷過戰爭的世代。反過來說，經歷戰爭的人也許已經放棄以戰爭之框來看待事物，但沒有經歷戰爭的人反而有可能執著以戰爭之框來看待世界。在集體的層次，戰爭之框可能夠成了某個社會的基本框架，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成員都無法從這個框架跳出來。戰爭之框的概念對於我們理解戰爭遺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提醒我們，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在物質、資源、人力動員等事情上面，而更在認知與精神層面。這些影響也不是暫時的，不會隨著戰事結束而消失；相反地，這些認知與精神層面的影響會因為戰爭之框而持續到戰後，甚至深刻地形塑人們的生命觀與世界觀。戰時這種「你死我活」的戰爭之框，並不會因為戰爭結束就銷聲匿跡。在民族主義的時代，以民族為名而進行的戰爭，戰爭之框也成了「國族之框」。戰爭之框在戰後經過制度化而成國族之框，形成了一種以國族為中心的世界觀或「國族觀」（nation view, Duara 1995, 汪宏倫2001a），提供人們理解國族、界定自我與他者的框架。在此意義下，國族之框可說是一種戰爭遺緒。即使戰爭結束，關於戰爭的詮釋、戰史的書寫、戰爭的記憶，戰爭之框仍會以國族之框的方式繼續起著作用。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背後都牽涉到不同程度的戰爭暴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大部分的民族主義背後都隱含一個或多個戰爭之框。

戰爭之框不必然只牽涉到某一個特定的戰爭；和社會運動的框構過程一樣（Snow et al. 1986），戰爭之框會隨著敵人的改變以及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不同的戰爭之框也可能存在聯合放大的效果。但唯一不變的是，戰爭之框必須合理化戰爭及其結果。暴力的結果經常是任意專斷的（arbitrary），作為一種集體暴力，戰爭也是如此。然而，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卻不接受戰爭及其結果的任意性；相反地，它們拒斥戰爭的任意性，反而想要從國族的歷史敘事賦予這些任意性相應的意義。因此，無論戰勝或戰敗，結果都不是任意的，而必須被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納入解釋。生命不能無故犧牲，鮮血不能任意白流，民族主義的神義論就在此發揮作用。蒼生不能無端受苦，犧牲必須有所回報：現在的犧牲是為了後世子孫的幸福，而繼起的國族成原則保證將會永遠紀念那些被犧牲的生命。國族的建構成了救贖的來源，這是為什麼民族主義特別看重新生、死亡與紀念（Anderson 1998）。

總結來說，戰爭之框不僅區分敵我、鞏固內部，還必須提供救贖，對戰爭的任意性賦予意義，更要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歌頌暴力，表彰烈士英雄，鼓吹犧牲生命，都是戰爭之框所必須樹立的價值觀。自18世紀後半以降，以「建立民族國家」為訴求的國族主義，是戰爭之框的主要基調，這股經過戰爭歷程來建立民族國家的熱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達於頂峰。二戰之後，歷經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與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毀滅浩劫，歐洲各國間力求和解，嘗試以區域整合來超越民族國家，而殖民主義在亞非各地節節敗退，戰爭之框也不再以國族主義為基調。冷戰時期，是以「共產集團」對上「自由民主陣營」為主要的框架，而在冷戰結束後，強調的則是人道主義與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反恐、人道救援

等）。在東亞，以國族主義為基調的戰爭之框仍主宰著這個地區的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對現在的認識、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而這也是當今東亞局勢充滿潛在的衝突與緊張的來源。

四、當代台灣社會中多重交錯、矛盾互斥的戰爭之框

前面提到，戰爭所造成的結構變遷，不只是改變人們的認知框架，同時也造成了領土疆界的變動、政府主權的更替、人民的歸屬改變與人口的遷徙等。這些結構性的變遷，正是當前台灣社會內部重大社會分歧的主要來源，而歷史認識問題僅為其一。

台灣國族問題的起源，可說與東亞近現代的一連串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暫且不論十七世紀鄭成功擊退荷蘭人以及施琅的攻台之役，近代史上與台灣國族問題息息相關的戰爭便有中日甲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乃至於韓戰等¹⁹。我們可以大膽地斷言，這幾場戰爭，只要有任何一場勝負逆轉或是不曾發生，台灣或許根本不存在國族問題，如果有，其性質與樣貌也必然和今日所見存在極大差異。這些戰爭所導致的版圖重劃與政權轉移，使得台灣也在不同的戰爭之框中被劃來劃去，一下子在框內、一下子在框外，而不同的戰爭之框之間，有的彼此敵對，有的則相互轉化變形。戰爭既然對台灣的國族問題存在如此根本的影響，我們也可以想見，這幾場戰爭對於形塑不同的歷史認識，也有關鍵而深遠的影響。如何詮釋這幾場戰爭的意義，也成了歷史認識問題中的重要爭議之所在。簡要地說，我們大致可以在當代的台灣，發現幾個多重交錯又矛盾互斥的戰爭之框：

（1）（碎裂的）「大東亞戰爭之框」：

這個戰爭之框，可說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遺緒。儘管許多台灣人民並不願被捲入戰爭之中，但在二戰期間，不少台灣男性或志願或被迫，以軍俠、軍屬、通譯、士兵等各種不同身份，參加了日本帝國的「大東亞聖戰」，則是不爭的事實（周婉窈 2003）。隨著日本戰敗與殖民帝國的瓦解，台灣的「大東亞戰爭之框」和其在日本本土的命運一樣，在戰後被有意識地拆解，取而代之的是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之框」。這同樣也是一個「典範轉移」的過程，原來在框外的「敵人」變成了框內的「祖國」。這個過程和日本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著明顯的差異。首先，和日本類似的是，戰後台灣也是以原來交戰敵手的戰爭之框來取代原有的戰爭之框，面臨「頭下腳上」的典範轉移。然而，台灣畢竟不是發動戰爭的主體，而是被迫接受殖民主義的戰爭之框，因此戰後要拋棄舊的框架，相對來說包袱較小。再者，和日本要面對一個種族、語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宗主國」（美國）相比，居台灣人口主流的漢人與中國大陸在歷史、文化、血緣上的聯繫，使台灣很容易認同這個原來在框外的「祖國」，即使台灣在被割讓時仍是由清朝統治，中華民國尚未誕生。因此，台灣毋須像日本在戰後經過一段漫長而痛苦的「擁抱敗北」的過程，而是歡天喜地地「慶祝光復」²⁰。弔詭的是，這個過程卻因為祖國的「抗日戰爭之框」，把台灣人視為曾被敵人的皇民教育所「毒化」、忠誠度可疑的

¹⁹如前所述，對於每一場戰爭，不同的稱呼後面隱含著不同的戰爭之框。例如甲午戰爭日方稱「日清戰爭」，國共內戰中共稱「解放戰爭」，二次大戰之交戰各方各有其稱呼，此處無法盡述，也不代表筆者特別偏好哪一種立場。

²⁰此處必須強調「漢人」，因為「光復」的意識主要來自漢人的祖國想像，原住民族則缺乏此一意識。相反地，戰前的日本是原住民族（日本殖民時期通稱「高砂族」）所接觸到的第一個現代國家，因此他們對日本的忠誠，往往較漢人來得更高。參見黃智慧（2011）。

二等公民，產生了諸多摩擦衝突。兩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一種隱形的戰爭之框已然成形，從「本省vs.外省」逐漸變成「台灣vs.中國」。此點將於下文討論。

和日本當今仍舊殘存的「大東亞戰爭之框」不同的是，台灣所留下的大東亞戰爭之框，並不具有現實的實踐意涵，而主要在於對過去的記憶與詮釋。台灣畢竟不是發動大東亞戰爭的主體，只是被動捲入，而當前的台灣也鮮少有人嘗試去提倡、合理化過去那場戰爭。對那些曾經參與過以「大東亞」為名的戰爭的人來說，他們所難以忘懷的，與其說是對「大東亞共榮圈」的憧憬夢想，毋寧說是對青春歲月的懷念、以及戰場上一同出生入死的同袍情誼。這些人有些或許仍抱著皇民思想、有些則未必²¹。他們人生中的黃金歲月曾經消磨在一場殘酷的戰爭中，但在戰爭結束後，他們被「敵」、「我」兩個戰爭之框所排除摒棄。他們的記憶不被承認尊重，甚且求償無門。由於得不到兩邊的認可，他們對新舊兩個政權往往都心懷怨懟不滿²²。

歷史學者周婉窈曾在一篇關於台灣人參戰經驗的論文中提到：「差堪告慰和慶幸的是，台灣人雖然被動地參與日本的對華戰爭，但派遭到大陸的台灣人並不是荷槍實彈的軍人」。言下之意是說，由於台灣人與中國人沒有在戰場上互相殺戮，因此有利於（與外省人所擁有的）戰爭記憶的「整合」（周婉窈2003：181）。不過，我們必須留意的是，戰爭之框最重要的作用在於劃清內外、區辨敵我，至於是否真的在戰場上交手廝殺，恐怕還是在其次。因此，即使台灣人在二戰期間沒有真的在戰場上與中國軍隊作戰，但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之框被界定為「敵人」，這對於日後獨派陣營形塑「中國」這個敵人，有相當的親近性²³。而統派陣營動不動把獨派形容為「日本皇民」，也是基於「大東亞戰爭之框」與「抗日戰爭之框」的對立而來²⁴。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所灌輸的大中國意識，獨派陣營往往避談「光復」而改稱「終戰」，因為台灣人很難在「戰勝者」或「戰敗者」之間定位，僅能以看似中性的「終戰」來指涉戰爭的終結。這個說法，在曾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輝主政時期開始流行起來。然而，「終戰」的字眼畢竟與日本所採取的說法相同，引發反對者「皇民意識」或「殖民遺毒」的批評²⁵。

（2）抗日戰爭與（消融中的）國共內戰之框

這兩個戰爭之框，是由以「戰勝者」之姿接收台灣、又以「戰敗者」身份撤退遷台的國民黨政權所帶來。這兩個戰爭之框雖然一脈相承，日後合而為一，但就其起源、時間、含意與影響都有不同。1945年被帶入的是抗日戰爭之框，其目的在於扭轉台灣人的戰爭認識，確

²¹ 無可否認的是，台灣仍有部分年長世代的人，標舉著「大和魂」，緬懷大東亞戰爭，甚至為之辯護。他們對過去歷史的解釋、以及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與採取「大東亞戰爭之框」看待世界的日本右派無異，兩者間也經常互相唱和。參見鄭春河（1995）。

²² 關於這些通稱為「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的遭遇，參見周婉窈（1997），蔡慧玉（1997）。另外，相較於上述男性，還有一群女性面臨的是深層的心理創傷。參見彭仁郁（2014）。

²³ 下文將會提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許多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過大東亞戰爭的台灣人被動員起來參與對抗國民政府軍隊的武裝作戰，進而形塑了新的「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之框。

²⁴ 另外值得參照的反例是，許多曾經在中國戰場直接參與殺戮的日本士兵，在戰後因為揚棄了「大東亞戰爭之框」，願意坦承過去的錯誤甚至道歉，反而能夠與中國人和解。曾經造成一時話題的東史郎即為一例。因此，若要論及記憶的「整合」或和解，重點不在於是否曾經在戰場上面對面直接交手廝殺，而在於採取什麼樣的識框來理解戰爭。

²⁵ 實際上，即使是獨派陣營內部，對於訴諸日本殖民遺緒來充當台灣民族主義內涵的作法頗有批評，認為台灣民族主義是從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發展出來的，應該與殖民者劃清界限，例如史明（2001：53）。

立中華民族的認同。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反攻復國」的國共內戰之框才以台灣海峽為界被確立下來，而其主要的功能則是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

和共產黨相較，國民黨版的中國民族主義同樣也凸顯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百年苦難與恥辱，但其所採取的框架與強調的內容，則與共產黨迥異。尤其有關抗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互相指控對方不抗日，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拯救民族危亡苦難的領導者²⁶。由於不同的戰爭之框將造成戰爭記憶的衝突，因此國民黨在接收台灣之後，便極力重建抗日戰爭之框，重新建立一套敘事框架，把台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種種作為都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包括將霧社事件納入「抗日戰爭之框」，甚至連從來沒有意識要為「中華民國」效命捐軀的莫那魯道也被祀入中華民國的忠烈祠，便是典型的「再框構」（reframing）的過程。

另一方面，國共內戰的框架，除了強調國民黨代表民族主義的正統之外，更大一部份在於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台灣社會被動員起來，透過戰爭來進行治理，成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維持威權統治的基礎；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句踐復國故事，也成為國民黨官方意識型態所一再強調的宣傳教化內容（黃金麟2009）。到了1950年代末，即使主客觀情勢已經顯示出「反攻無望」，但「動員戡亂」的戰時動員體制仍然牢牢地桎梏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除了包括戒嚴令在內的各種法令規章外，為了代表法統、維護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萬年國會，也可說是戰爭之框的產物。為了維持威權統治，國民黨政權在「動員戡亂」的名義下，一方面以戰爭威脅恐嚇人民，一方面則以「安定進步」、「和平繁榮」為訴求，限縮政治自由，壓制反對勢力。在此脈絡下，台獨與中共、黨外被塑造成「三合一」的敵人，都對台灣的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內部敵人與外部敵人合而為一。

在此情況下，為了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戰爭之框與為了維持威權統治的國共內戰之框合而為一，成為冷戰時期台灣社會的基本框架。此一時期，除了學校中所推行的歷史教育、軍訓教育、保（密）防（諜）教育外，戰爭與軍事題材也成了大眾媒體與商業娛樂的重要元素。1970年代起，國民黨營的中央電影事業公司與軍方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大量以戰爭及軍事教育為題材的電影，包括《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梅花》、《古寧頭大捷》、《黃埔軍魂》、《成功嶺上》等，除了商業放映外，也透過學校、機關、社教活動與電視頻道等大量反覆播映，成為台灣戰後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我們可以說，國民黨自1945年以來在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建立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兩個戰爭之框上，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其實也同時拆解了這兩個戰爭之框。若林正丈（1989）以「脫內戰」來描繪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正是捕捉到了這個特質。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中華民國正式邁向「第二共和」，與國共內戰脫鉤²⁷。由於「共匪」不再被視為一個叛亂團體，國軍開始有了「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惑。過去官方所界定的「三合一」敵人不復存在，中共已經不再是假想敵，「黨

²⁶ 關於兩岸對抗戰的歷史書寫與紀念方式的差異，可參考張瑞德（1998）。事實上，兩岸對抗日戰爭的詮釋與歷史書寫，近年來也成了政治問題，每逢相關歷史紀念日時便被拿出來討論。共產黨過去一味強調自己在抗戰中「中流砥柱」的角色，對國民黨的角色不是刻意忽視就是扭曲抹煞。近年來，為了對台灣釋出善意，許多影視通俗作品已經較多地呈現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貢獻，而即使對解放戰爭的描述，國民黨的正面角色也比以往多了不少。不過，中共官方喉舌與政治領導人在正式場合言及抗戰時，仍舊只片面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²⁷ 「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說法源自若林正丈（1994），李登輝本人後來也採用類似的說法（林佳龍2001：255）。

外」成為合法政黨，而台獨不但成為合法的政治主張，受言論自由保護；尤有甚者，提倡「獨台」路線的李登輝與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更先後贏得總統直選，成為三軍統帥。

儘管動員戡亂時期已經終止，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和對岸的共產黨政府處於「交戰狀態」，但國共內戰的框架，仍是國民黨、統派以及對岸的共產黨定位兩岸關係的基本框架。換言之，儘管敵對關係暫不存在，但兩岸的關係仍被界定為因為內戰所造成的分裂。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基本上已經完成了「脫內戰」的過程，但國民黨在2008年後重新執政，在兩岸政策上試圖再次回到國共內戰的框架來詮釋兩岸關係，引發新的緊張、扭曲與矛盾。此點將於下一小節討論。

值得留意的是，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框架，其實也是台灣社會內部分歧的主要區隔之一，例如所謂「本省」與「外省」的族群分類，背後也存在著戰爭之框所造成的區隔。尤其「外省人」因為戰亂而造成的流亡意識與離散經驗，是世代定居在台灣的「本省人」所缺少的。過去一種常見的說法認為，「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類屬，其實是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為族群動員而被打造出來，畢竟「外省人」之間在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不會比他們與本省人之間來得小。不過，這樣的看法，恐怕低估了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對框構現代中國國民（來到台灣後變成「外省人」）的影響。外省人所共同擁有的，是「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他們有著共同的戰亂經驗，也有流亡主體所共有的恐懼（流離失所、無處可逃，有可能「被本省人丟到海裡」）。相對地，普遍缺乏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經驗的本省人，即使不再抱持「大東亞戰爭」的識框，但因為雙方曾經身處敵對的陣營，彼此之間的猜忌與不信任，在戰後依舊持續，甚至進一步轉化成為新的「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之框²⁸。

（3）「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

台灣存在的第三種戰爭之框，可以用「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來概括。和前兩種戰爭之框不同的是，這個戰爭之框是以台灣為預設的戰爭主體，不存在另一個殖民母國或祖國。如前所述，民族主義的背後多有一個或多個戰爭之框，台灣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從台灣民主國開始，台灣早期的武裝抗日行動雖然缺乏清楚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而且不乏「前現代」的特質，但一個「我族vs.他者」、對抗外來統治者的戰爭之框，已然存在台灣社會。到了1945年以後，由於對「祖國」的失望，「外來統治者」的指涉對象從日本殖民政府轉為國民黨所代表的外省人/中國政權，二二八事件所引發的激烈對立衝突，對某些參與者與詮釋者來說，其實已經不啻一場戰爭²⁹。這個「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之框，將國民黨視為來自台灣外部的殖民統治者，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是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所一貫堅持的識

²⁸ 這種戰爭體驗對歷史認識所造成的深刻影響，可以從一位參與一場論辯台灣前途公民會議的外省老兵的話看出來：「小老弟，你知道的歷史，都是書本上讀來的；我知道的歷史，是親身參與，打過仗的。」這句話讓不曾經歷過戰爭、主張台灣獨立的年輕人產生極大的震撼（范雲2012：247）。同樣地，我們可以想見，曾經在「大東亞戰爭」中處於中國對立面的本省人的戰爭體驗，對於他們的歷史認識也產生深刻的影響。

²⁹ 值得留意的是，戰爭在此處並不僅僅是個比喻，而是實質存在。從現有的研究與資料可以發現，當時全台各地都有組織武裝部隊的記錄，曾經參與大東亞戰爭的台籍日本兵也在動員之列，參與對抗國民政府軍隊的作戰。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有關暴動、叛亂、起義、內戰等不同概念與戰爭間的模糊關係，參見朱元鴻（2014）。

框³⁰。這個識框，基本上是針對台灣過去因戰爭造成統治者更迭所導致的苦難傷痛，逐漸醞釀而產生。

到了199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執政黨從人民主權、而非歷史法統取得了執政合法性，中華民國也因為「第二共和」而獲得正當性，一種新的「反侵略、反併吞」的戰爭之框開始浮現。這個新的戰爭之框，伴隨中共不斷的軍事演習與武力威脅而逐漸醞釀生成，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臻於完備。「中共武力犯台」不再只是國民黨拿來恫嚇人民、打擊「三合一敵人」的藉口，而是活生生的經驗事實，進一步激發台灣內部「同仇敵愾」的共同體想像³¹。這個戰爭之框，延續著國民黨過去反共、仇共、恐共的框架，但已經被「轉調」(re-keying)或重新定調。此時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已經無法再用「國共內戰」的延續來理解，而是被視為「侵略」、「併吞」；兩岸間的對抗，被理解為作為新興的想像共同體（無論其名稱為「中華民國」或「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爭。

就當前的台灣民族主義而言，無論是否認同「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認為「建國尚未成功」或認為「台灣已經獨立」，都共享這個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例如黃昭堂就曾說：「面對中國的對台侵略，台灣人應有『來，就戰罷！』這個決心，否則不要奢望獨立，也不要以為維持現狀就能保持平安。……不惜一戰的決心，是台灣最需要、最基本的國防能力」（黃昭堂1998：178，底線為筆者所加）。史明（2001）的武裝鬥爭路線原來針對的是國民黨政權，但後來也針對中國。從1992年至2008年，無論是國民黨的李登輝或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這個戰爭之框都是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的。弔詭的是，獨派陣營一方面要擺脫國共內戰的遺緒（因此台灣問題不應被視為中國國內事務、也不是國、共兩黨可以私相授受予以解決），一方面則又承襲了國民黨的「反共」遺緒，將「反共」轉調成「反中」，建構出新的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

上述的戰爭之框，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的時代，儘管執政黨不同，但都得到國家機器的背書支持。2008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之後，大陸政策改弦更張，對中國不再採取對抗的策略，不但招致獨派陣營「親中賣台」的批評，也引發了「敵我不分」的疑慮。由於獨派陣營把中國當成框外的敵人，因此舉凡與中國相關的事務，包括資本、企業、觀光客、留學生等，都傾向於採取敵視或防禦的態度。「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其實繼承了「大東亞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框架，把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僅是將前兩個戰爭之框加以轉調。2013年，馬英九出席世界自由日大會活動，發表了一席關於兩岸和平的談話，卻引來獨派陣營的強力反駁與抨擊。我們可以從《自由時報》的社論來理解這個轉調的變化：

馬英九為了強調和平的重要性，又指「兩岸有相當長時間處於內戰狀態，死亡人數可說破百萬人」，這就更讓人不解馬在不知所云什麼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打內戰，死了超過百萬人是有的，但「兩岸」之間何時打過內戰？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八年，發生的是國與國之間的中日戰爭，台灣當時是日本殖民地；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國共爆發

³⁰例如主張武裝鬥爭路線的史明，把台獨運動定位為「反殖民地革命」，反對民進黨的體制內改革，認為必須推翻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獨立革命才算達成。

³¹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1990年代的台灣曾經出現過一本描述解放軍攻台的預言小說《一九九五閏八月》（鄭浪平1994），雖然事後證明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但從當時這本書的熱賣與台灣社會的議論反應來看，當時正值民主轉型的台灣，的確深深被戰爭陰影所籠罩。

內戰時，戰場在中國，因此，馬英九的「兩岸內戰說」可以休矣！兩岸之間若爆發任何軍事衝突，就是侵略，毫無模糊地帶，更不容主政者懷抱大中國情結危及台灣的安全。
(《自由時報》2013/1/24 社論)

這段文字可幫助我們理解獨派陣營如何承襲過去既有的戰爭之框並加以轉調。第一，1945年以前，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中國其實是屬於敵對狀態，而且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不是內戰。第二，國共內戰在時間和空間上，僅限於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與台灣無涉。第三，兩岸之間的軍事敵對關係不是「內戰」，而是「侵略」，且「毫無模糊地帶」。很顯然地，這段文字極力想要撇清台灣與國共內戰的關係，另外重新樹立一個「反侵略」的戰爭之框，而1949年以後台海曾經發生過的諸多戰役，在這套框架下，也從國共內戰被轉調為「反侵略」的戰爭了。

五、歷史認識問題中的史觀與框架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在當前的台灣存在著多重的戰爭之框，這些戰爭之框彼此之間存在矛盾，卻又相互生成轉化，以致造成許多矛盾或弔詭的現象。從這三種戰爭之框來看兩種史觀的形成與對立，我們也比較容易掌握台灣歷史認識爭論的內容與本質。以下，我們先從兩次教科書爭議所涉及的主要內容開始看起。

根據王甫昌（2001）的整理，在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中，媒體報導的主要內容是環繞著「台灣的過去」與「台灣的現在」兩條軸線而展開。在關於「台灣的過去」方面，主要爭議的內容依據出現的頻率依序是「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對兩蔣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例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對於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等。至於「台灣的現在」方面，主要的爭議內容依序是「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台灣地理範圍的界定」、「台灣內部族群的分類」、「對現實政治人物的評價」等（參見表一）。

表一 《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事件新聞報導所顯示的爭議內容與立法委員李慶華所提的
32 點質疑內容*

爭議主題	出現的則數				佔總 數%	李 慶 華
	支持	反對	編纂	小計		
一、臺灣的過去						
臺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	141	43	22	206	60.4	8
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	58	48	23	129	37.8	5
對兩蔣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	38	10	2	50	14.7	1
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	36	25	13	74	21.7	3
對於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	27	31	7	65	19.1	0
二、臺灣的現在						
對現狀的描述：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48	13	10	71	20.8	7
臺灣地理範圍的界訂	12	7	2	21	6.2	0
臺灣內部族群的分類	19	15	4	38	11.1	1
對現實政治人物的評價	28	46	20	94	27.6	5
報導或事件總則數	185	77	79	341		32

*引用自王甫昌（2001：151）之表二，表頭略有修改。

在這些議題中，最重要的、出現頻率最高的，便是台灣與中國、日本的關係，而這當然也牽涉到台灣的國家定位、乃至台灣的地理範圍界定、以及台灣包含哪些人（族群分類）的問題。這反映了本文一開始所說，「台灣」一詞的指涉與含義，無論就地理範圍、政治意涵還是群體集合來說，本身就是一個歷史認識問題。而對兩蔣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歷史事件的選擇與遺忘、以及對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相互尊重，主要則是針對1945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後，被刻意壓抑否定的日本殖民經驗、同時以國家暴力清除異己所創造出新的被傷害的經驗與被壓抑的記憶。

2014年的課綱微調，則是修訂了民進黨時期所通過的課綱中之部分用語，並新增了一些內容，強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連帶。持反對立場的《自由時報》，根據課綱微調前後內容做了一個比較對照表，並將這些變動以「馬政府去台灣化之圖謀」來加以詮釋（參見表二）。

教育部將這次的修訂稱為「微調」，暗示調整幅度不大，只是修改了其中幾個用語。然而，從反對者的眼光看來，這些微小的變動，其實已經牽涉到整個史觀的改變。依據本文的分析來看，則可說是框架的改變。首先，史觀的差異，背後隱含著戰爭之框的對立，使得兩種史觀之間無法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根據戰爭之框的邏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日本殖民統治雖然也曾給台灣帶來苦難與傷痛，但比起國民黨政權，日本殖民政府反而顯得不那麼壞；尤其國民黨政權背後象徵著中國傳統威權專制封建腐敗等意義，相稱之下，脫亞入歐的日本反而顯得「現代化」許多。對於追求現代性的台籍人民來說，日本更顯得比中國可欲。大東亞戰爭的經驗與框架，使得反對國民黨的台灣人很容易把台灣與日本結合，與中國對立起來。

表二 2014歷史課綱微調初稿內容對照與批評者之反對理由*

現行課綱	微調後	反對理由**
荷西治台	荷西 <u>入台</u>	淡化他國政權統治台灣之事實，強化中國統治之正當性
鄭氏統治時期	<u>明鄭</u> 統治時期	將鄭氏政權納入中國，強調台灣在鄭氏時期也為中國所統治
說明鄭氏的對外關係，如與荷、英所定條約內容，並述及與清朝的談判	說明 <u>明鄭</u> 的對外關係以及覆滅的經過	新增鄭氏政權被中國清代覆滅之主題，強調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歷史教育
清代、日本統治時期	清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改稱清代為清廷，強化台灣與中國，地方與中央朝廷的關係
無	<u>在日本統治時期加入1895年後中國與台灣的互動</u>	強化中國與台灣的連結
無	<u>在日本統治時期加入中國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對台灣的影響</u>	強化中國與台灣的文化連結
中國	中國大陸	將台灣主體史觀改為大中國史觀
無	<u>加入兩岸分治主題，強調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治權不及大陸地區</u>	將台灣主體倒退回兩蔣的復興基地

*資料來源：取材並改編自《自由時報》，2014/1/18，A4。表頭標題已更改。原表中之紅字部分以底線方式標出。

**本欄原標題為「馬政府去台灣化之圖謀」，其餘文字原文照錄。

其次，兩種史觀都因戰爭所造成的結構變動而產生，這裡的結構變動，包括戰爭所造成的領土變動（台灣從清朝的領土變成日本殖民地，再變成中國領土[獨派則主張地位未定]）、政權更替（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流亡到台灣）、以及人民遷徙等。大量具有抗日戰爭記憶的「外省人」隨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他們的戰爭認識與「本省人」是相衝突的。這所造成的問題，不是只有所謂「省籍」或「族群」的差異，而是兩個群體的集體記憶框架——戰爭之框——彼此是相互衝突矛盾的。

由於這樣的差異，採取不同框架的人，對於過去與現狀的認定十分不同，歷史認識問題也由此產生。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歧異，在於對戰爭性質與結果的認定。從採取抗日戰爭之框的中國史觀來看，台灣是日本侵華過程中，以不當方式取得的殖民地，既然中國的抗日戰爭最終贏得勝利，台灣歸還中國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從台灣史觀來看，《馬關條約》是合法的國際條約，日本取得台灣是「合法」而具有正當性的³²。中國史觀認為日本戰敗之後，台灣是根據《開羅宣言》被交還給中國，然而台灣史觀則是一方面聲稱開羅宣言不具正式法

³² 《馬關條約》也被獨派當成中國對台灣「無情無義」的象徵。這涉及了前文提到國族問題中的情感面問題，此處暫不深論。

律效力，一方面援引《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強調「台灣主權未定」³³。至於1949年之後的兩岸對峙局面，中國史觀強調用「中國內戰」的框架來鎖定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而台灣史觀則是企圖「脫內戰化」，強調透過民主化所產生的新的政治共同體，使得兩岸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內戰，而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如果發生戰爭，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而非內戰。中國史觀不斷地想要處理過去的戰爭遺緒（「收復失土」，完成統一），台灣史觀則是肯定過去戰爭所造成的既有現實（結構變動），企圖以既有事實來作為理據，不希望再做改變。

表三 不同史觀對戰爭的態度對照表

	中國史觀	台灣史觀
甲午戰爭	甲午敗戰、割讓台灣為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	日本打敗清朝，根據《馬關條約》合法取得台灣。
二次大戰	根據《開羅宣言》，台灣歸還中國。	根據《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台灣地位未定。
國共內戰	懸而未決，有待日後協議談判。	1949年已經結束，共產黨取得勝利，國民黨為外來的流亡政權。中共若以武力犯台，即為主權國家間之戰爭。

從發生學的先後順序來看，史觀可以說是戰爭之後產生的結果，戰爭之框對戰爭體驗、戰爭記憶以及歷史的記述，都產生深刻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導致新的戰爭。史觀代表一種觀看歷史的觀點，而觀看歷史預設了主體的確立。甲午戰爭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召喚出中國這個民族主體，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日本是最大最重要的他者。另一方面，多重的戰爭與反抗統治者壓迫的經驗，也激發出台灣這個主體。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的獨派論者巧妙地借用了中華民國的制度軀殼，並挪用、轉化了國民黨的反共戰爭之框³⁴。這兩種史觀都隨著時間而逐漸形成、轉化、改變，並非固定不變的，而多重的戰爭更是在此一過程中具有根本而深邃的影響。問題是：戰爭因何而起？在這些戰爭背後，還有什麼值得進一步考察的？這是有待下一步研究繼續深究的問題。

六、結語

本文嘗試將台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帶入東亞的討論脈絡，僅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提出簡要勾勒與初步分析。透過現象學的考察，本文指出所謂的史觀其實是戰爭衍生出來的問題；與其辯論史觀，不如退一步反省戰爭。下一步必須加以還原考察的，便是被稱為戰爭的這種現象。通過「戰爭之框」的概念，本文試圖揭露戰爭在這個看似和平的時代所曾經發生的作用與留

³³ 日本在《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1952年8月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雙方代表在台北簽訂，一稱《台北和約》）中，均未言明將台灣主權交付給任何對象，因此許多主張台獨的論者據此認為台灣戰後地位未定，台灣人民有自決的權利。然而，學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中日和約》已解決了台灣的主權問題。參見林滿紅（2002）。

³⁴ 此處必須強調「一部分」，因為獨派陣營中，對於是否接受「中華民國」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也有「台灣已經獨立」與「建國尚未成功」的路線區隔。某種意義下，這也可說是獨派陣營內部的「歷史認識問題」。

下的影響。戰爭裡有太多生離死別的感人故事，有人性的扭曲，有命運的捉弄擺佈，有捨己為群、犧牲奉獻、捨生取義的高尚情操，另外還有慘絕人寰的凌虐殺戮，以及多不勝數、無情殘酷的悲慘遭遇。如果不去探究戰爭之框及其背後的作用與意涵，我們很容易深陷在記憶的泥淖裡，在紛亂複雜的細節中迷失，甚至流於表面浮淺的描述、感慨與喟嘆。面對形形色色的戰爭之框保持清醒與警覺，是我們處理歷史認識問題時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態度。

戰爭之框也幫助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為何無法和解、甚至要相互殘殺。不去追究戰爭之框的形成，無法從根化解紛爭、達致和解。戰爭與國家暴力所造成的苦難與傷痛，其實是類似的，不同群體間的苦難經驗，也有很多可以相通之處。然而，戰爭之框卻隔離了不同的群體，阻斷了彼此的感知與體驗交流。框內與框外難以相互理解，兩個敵對的戰爭之框尤其如此，彼此不可共量。現代性強調人的平等與尊嚴，戰爭之框卻讓人的生命不再平等、也失去尊嚴。有些人的生命比起另外一些人更有價值，有些生命的失去是「可悲傷的」，而另外一些生命的失去則是「不可悲傷的」。用克勞塞維茲的話來說，戰爭以屈服敵人的意志為目的，因此戰爭之框的存在，不僅妨礙了彼此的理解，也阻斷了溝通與對話的可能。

最後，歷史認識問題要如何解決——如果解決是可能的話？歷史認識問題既是國族問題的一環，要化解歷史認識的衝突，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國族問題。如前所述，台灣的國族問題除了認知面外，尚有制度面與情感面的問題需要克服——要言之，制度困境需要解決，悲情意識需要化解、戰爭之框需要超越，這三者缺一不可。

上述結論，對東亞各國來說也同樣適用。歷史認識問題是國族問題的一環，要「解決」歷史認識問題，必須先解決國族主義的問題。當前的世界，仍是一個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意味著這個社會是由現代國家所界定的「國族」所構成，我們仍舊活在國族現實（*nationalist reality*）當中³⁵。要超越國族歷史，必先超越國族現實。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不能只單一地要求特定一方要超越國族主義，但對於另一方的國族主義卻視而未見或輕輕放過，這不僅對台灣內部的統獨雙方是如此，對中、日、韓等國也同樣適用。

筆者過去對台灣、中國、日本的研究也發現，在交錯的民族主義之下，其實存在著「重層的怨恨結構」。換言之，東亞的幾個社會，都曾經因為歷史上的屈辱、挫敗、苦難與悲情而存在著明顯的怨恨心態（*resentiment*），甚而進一步形成了「怨恨的共同體」。這些怨恨的共同體之間並沒有因為彼此曾經共有的被壓迫與受害經驗而更加瞭解彼此或形成共同連帶，反而彼此怨懟嫌惡，形成了東亞重層的怨恨結構（汪宏倫2010, 2012, Wang 2014）。若要化解這些問題、達到和解共生的目的，那麼，民族國家的體制必須被檢討，受傷害的情感必須獲得療癒，價值必須重估，既有的認識框架必須被超越。這些不僅是台灣要面臨的課題，也是整個東亞社會必須一起思考、共同努力解決的課題。

參考書目

- 一、中文及日文書目
- 《自由時報》，2013/1/24，〈社論〉。
- 《自由時報》，2014/1/18，A4。

³⁵ 根據現象學的社會學，所謂的社會其實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現實（*reality*），其中牽涉到客觀世界的主觀化與主觀世界的客觀化（Berger and Luckmann 1967）。當前的社會，無論就「國內」或「國際」的層面而言，基本上都是由民族國家的制度所建構出來的，筆者將之稱為「國族現實」（Wang 2002）。

- 子安宣邦，2004，《國家と祭祀：國家神道の現在》。東京：青土社。
- 小林よしのり，1998，《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戦争論》。東京：幻冬舎。
- 小林よしのり，2000，《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SPECIAL：台湾論》。東京：小学館。
- 中日韓三國共同歴史編纂委員會（編），2013a，《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國際秩序的變遷》。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中日韓三國共同歴史編纂委員會（編），2013b，《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下）：制度、人、社會》。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日中韓3国共通歴史教材委員會（編），2006，《未來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3国の近現代史》。東京都：高文研。
- 比較史・比較歴史教育研究会（編），2002，《帝国主義の時代と現在：東アジアの対話》。東京都：未來社。
- 王仲孚（編），2001，《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新編》。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
- 王甫昌，2001，〈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145-208。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市：蓬島文化公司。
- 史明，2001，《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台北：前衛。
- 田習如，2002，〈《認識台灣》教科書刪改案外案：《〈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原來是大陸作品〉。《今週刊》2002/01/06:18。
- 朱元鴻，2014，〈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即將出版）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市：時報文化。
- 呂實強，1996，〈國中新課程——「認識台灣（歷史篇）」科設立的經過與教材教學有關的幾項問題〉。《國立編譯館通訊》9(2):17-24。
- 李壽林（編），2001，《三腳仔：《台灣論》與皇民化批判》。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
- 杜正勝，1997，〈一個新史觀的誕生〉。《當代》120:20-31。
- 汪宏倫，2001a，〈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1:183-239。
- 汪宏倫，2001b，〈台灣為何要「自找麻煩」？全球化趨勢與台灣的國格問題〉，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267-302。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 汪宏倫，2006，〈怨恨的共同體，台灣〉。《思想》1:17-47。
- 汪宏倫，2010，〈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19:147-202。
- 汪宏倫，2012，〈淺論兩岸國族問題中的情感結構：一種對話的嘗試〉，收於徐斯儉、曾國祥編，《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頁181-231。新北市：左岸文化。
- 汪宏倫 2014a 〈東アジアの近代の理論化のために：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戦争のフレーム」〉，《思想》（岩波書店）2014/2(1078):26-55。
- 汪宏倫，2014b，〈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即將出版）
- 周婉窈（編），1997，《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籌備處。

- 周婉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 東アジア文史哲ネットワーク（編），2001，《小林よしのり「台灣論」を超えて—台灣への新しい視座》。東京都：作品社。
-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編），2005，《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佳龍，2001，〈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形成〉，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217-66。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 林滿紅，2002，《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台北市：麥田。
- 若林正丈，1989，《転形期の台灣：脫内戦化の政治》。東京都：田畠書店。
- 若林正丈，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
- 范雲，2012，〈「台灣共識」如何可能？一個來自公民社會的觀點〉，收於徐斯儉、曾國祥編，《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頁 233-51。新北市：左岸文化。
- 高橋哲哉（編），2002，《〈歷史認識〉論争》。東京都：作品社。
- 高橋哲哉，2005a，《靖國問題》。東京：筑摩書房。
- 高橋哲哉，2005b，《國家と犠牲》。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 國立編譯館（編），1997a，《認識台灣（歷史篇）》。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 國立編譯館（編），1997b，《認識台灣（社會篇）》。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 張瑞德，1998，〈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於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75-1138。台北：國史館。
- 許南村（編），1999，《《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 彭仁郁，2014，〈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即將出版）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台北：聯經。
- 黃昭堂，1998，《台灣那想那利斯文》。台北：前衛出版社。
- 黃昭堂等，2001，《台灣論風暴》。台北市：前衛。
- 黃智慧，2011，〈解讀高砂義勇隊的「大和魂」：兼論台灣後殖民情境的複雜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1(4):139-74。
- 蔡慧玉（編），1997，《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鄭春河，1995，《台灣に生きる大和魂》。沖繩：吉武進。
- 鄭浪平，1994，《一九九五·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白皮書》。台北市：商周文化。
-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市：聯經。

二、英文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1998. "The Goodness of Nations." Pp. 360-68 i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1-39.

-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Butler, Judith.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New York: Verso.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 Maurice.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Oliver, Pamela E., and Hank Johnston. 2000. "What A Good Idea! Ideology and Fram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obilization* 5(1):37-54.
- Renan, Ernest. 1990[1882]. "What is a Nation?" Pp. 8-22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ited by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 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now, David A. 2004. "Framing Processes, Ideology, and Discursive Fields." Pp. 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2000. "Mobilization Forum: Comment on Oliver and Johnston." *Mobilization* 5(1):55-60.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64-81.
- Wang, Horng-luen. 2002. "Mind the Gap: on Post-National Idea(l)s and the Nationalist Reality." *Social Analysis* 46(2):139-147.
- Wang, Horng-luen. 2014. "Comparison for *Com-passion*: Exploring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zing Taiwan*, edited by Ping-hui Liao and Shu-me Shi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orthcoming).